

《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美国犹太族群 交互中的西方文明困境书写

李栋^{*}

【摘要】纽约曼哈顿文化地理版图中泾渭分明的德国犹太人和东欧犹太人是贝娄在《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着重关注的两大群体。作者强调前者之“邪恶”，关注后者之“良善”，并通过聚焦前者对后者的道德“腐蚀”所引发的伦理“混乱”，不仅再现了两大犹太族群交互的历史真实，更在本质上关切了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西方）社会呈现的“无序”困境。贝娄认为，犹太启蒙运动中被“解放”的德国犹太人是西方启蒙运动中的犹太代表，他们对“个体性”的追求容易引发“无序”，造成“混乱”。为此，贝娄为德国犹太人贴上了“邪恶”的标签，并由此寄寓了西方文明之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陷入困境的原因。

【关键词】德国犹太人；邪恶；东欧犹太人；个体性；混乱

1970年，索尔·贝娄出版了长篇小说《赛姆勒先生的行星》（*Mr. Sammler's Planet*），并由此获得当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在这部小说中，贝娄一反常态，并未以他极为熟悉的芝加哥^①为背景，而是将故事的发生地移至“令他厌恶的纽约”^②。这看似随意之举其实大有内涵：首先，纽约曼哈顿通常是欧洲犹太移民到达美国的第一站。来自欧洲不同地区的犹太群体在初抵美国时，都会在纽约曼哈顿汇集，而他们的相遇及彼此间的影响就成为贝娄在这部小说中关注的焦

^{*} 李栋，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讲师。

^① 事实上，在贝娄的创作过程中，故事发生地曾几经其变。在最早期的手稿中，主人公“居住于芝加哥南区（the South Side of Chicago）”；此后，贝娄又将其变更为“纽约皇后区”；最终，贝娄选定“曼哈顿”作为故事的发生地。Zachary Leader, *The Life of Saul Bellow: Love and Strife, 1965-2005*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8), 69.

^② Ruth Miller, *Saul Bellow: A Biography of the Imagina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185-186.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6辑

点。其次,“贝娄对纽约的描述通常都在痛斥这个城市混乱、暴力和危险的状态”^①。由此,小说的整个叙事进程可能围绕“犹太移民群体”和“混乱危险状态”等维度展开。这部完稿于1969年8月(1969年1月上台的尼克松政府“标志着20世纪60年代的结束”^②)的小说更像是贝娄站在历史的分水岭回望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混乱、无序的美国,并试图从根源上找出社会动乱原因的一种尝试。

通过极隐匿的方式,贝娄在小说开篇不久即向读者引出了一个在美重要犹太人群体。小说的主人公赛姆勒先生有一个看似平常的名字——阿图尔·赛姆勒(Artur Sammler),而这个名字其实暗藏玄机。正如赛姆勒本人在提到母亲为自己取名时所言:“她给我取了一个解放后的名字:阿图尔(Artur)。”^③此外,赛姆勒先生的姓氏Sammler其实也传达出某种暗示性的信息;对此,批评家曼宁在其文章中有过关注,“Sammler本身是一个德语单词”^④,而赛姆勒先生又是一名犹太人。将以上围绕赛姆勒先生名字及民族身份所得出的“解放的”“德国(语)”以及“犹太人”等字眼连接在一起,就可以破解出一条令人豁然开朗的隐含信息——被解放的德国犹太人。而这一犹太群体及其所承载的理念将成为贝娄这部小说中的关键主题。他对西方个人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究,对西方困境症结的判断,都围绕这一群体具体展开。

在美国犹太族群发展历史上,德国犹太人和东欧犹太人可谓泾渭分明的两大群体。德国犹太人多在1848年前后移民美国,开启了犹太人大规模移民美国的先河^⑤;而超过200万东欧犹太人则于1881—1924年移民美国^⑥,最终构筑起在美犹太人的主体。在东欧犹太人初抵美国、茫然无措之时,先来一步的德国犹太人大多已在美国站稳脚跟。在小说中,贝娄首先借曼哈顿文化地理信息巧妙

① Gustavo Sanchez Canales, “Bellow’s Cityscape: Chicago and New York”,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aul Bellow*, ed. Victoria Aar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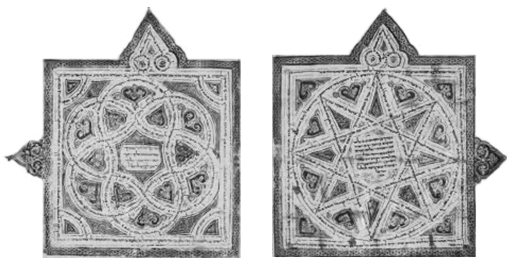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② M. J. Heale, *The Sixties in America: History, Politics and Protest*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 2001), 107.

③ Saul Bellow, *Mr. Sammler’s Planet* (London: Penguin Modern Classics, 2007), 68.

④ Gerald F. Manning, “The Humanizing: A Theme in Mr. Sammler’s Planet,” *English Studies in Canada*, vol. 3, No. 2 (Summer 1977): 222.

⑤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为数甚众的对时局失望且不满的欧洲移民前往美国,史称“48人”(forty-eighters),其中便有大量德国犹太人,形成了德国犹太人移民美国的一波高潮。Deborah Pessin, *History of the Jews in America* (New York: The United Synagogue of America, 1957), 112-113.

⑥ 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被刺,犹太人成为该事件的替罪羊。针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Pogrom)成为一种从南至北席卷沙皇俄国的有组织行动,并最终导致东欧犹太人大规模移民美国。截至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新的法律限制移民数量,有超过200万东欧犹太人移民美国。Deborah Pessin, *History of the Jews in America* (New York: The United Synagogue of America, 1957), 173-176.



引出在此生活的德国犹太人和东欧犹太人；其次分别聚焦该两大犹太群体，挖掘前一群体身上所折射出的“邪恶”和“罪孽”，探查后一群体体现着的“良善”和“无奈”，进而通过梳理东欧犹太人对德国犹太人的经济攀附，阐释德国犹太人对东欧犹太人不可逆转的道德腐蚀；最后，贝娄从德国犹太理念所蕴涵的“个体性”特质介入，探究由此导致个体与社会层面的“混乱”和“失序”状态，并悲观地引申出一个终极的主题——西方社会自启蒙运动以来所固有的本质矛盾与问题。贝娄笔下，德国犹太人缘何与“邪恶”相关联？导致西方世界个体与社会层面混乱失序的根本症结又是什么？作为一名严肃作家，贝娄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开始以犹太视角探查西方社会内在的根本性问题，这部小说即是贝娄为西方社会把脉问诊，指出西方社会的顽瘴痼疾的一次关键尝试。

一、曼哈顿文化地理版图中的德国犹太人和东欧犹太人

贝娄在文本中使用了纽约曼哈顿的大量街名和地名，这并非仅仅出于故事情节发展之需，如将这些真实的地理信息串联起来，并辅之以相关历史、社会因素进行解码，则可破译出作者隐含于文本中的重要指向性信息。同时，也能够发掘出作者内嵌于字里行间的真实情感。

小说第一章开篇不久，贝娄即借赛姆勒先生乘公交车之机，描述了一起其所目睹的盗窃事件，而在这起事件中，贝娄着重提及了曼哈顿的几个具体地标：赛姆勒从位于曼哈顿中城^①的“42 大街图书馆”（即纽约公共图书馆，New York Public Library）位置乘车一路北上；黑人扒手则“从哥伦布圆环^②（Columbus Circle）上车”^③。根据赛姆勒先生的描述，黑人扒手在公交车上作案时，车辆正位于“72 大街”^④，而 72 大街地处曼哈顿上城（Uptown），也就是曼哈顿的北部。这起事件会给细心的读者留下模糊的印象，即曼哈顿上城区似乎隐约间与“邪恶”或者“犯罪”存在某种关联^⑤。

① 纽约曼哈顿从南到北大体可以分为下城（Downtown）、中城（Midtown）和上城（Uptown）三个区域。

② 哥伦布圆环位于 59 街，中央公园的西南侧，是曼哈顿的一处地标。

③ Saul Bellow, *Mr. Sammler's Planet*, 2.

④ 同上。

⑤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贝娄作品中城市与罪恶的关联。学者乔国强就任在其专著中指出，“在贝娄的笔下，城市不是代表人类文明的集散地。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城市代表了现代社会的罪恶”。乔国强 Qiao Guoqiang,《美国犹太文学》修订版 [American Jewish Literature revised edition]（上海 [Shanghai]：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9），359。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6辑

为了进一步强化读者的这种印象,同样在小说的第一章,时隔不久,贝娄再次详细记述了赛姆勒先生与这名黑人扒手的又一回不期而遇,细致入微地呈现了这名盗贼作案的全过程。这次,赛姆勒先生刚刚结束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次失败的讲座,深受打击。他从“百老汇大道和 116 街附近”^①上公交车后,因为讲座引发的痛苦经历而心事重重,胡思乱想间,却又发现了那名穿戴讲究的黑人扒手,再次目睹了公交车上的罪恶。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在黑人扒手作案得逞“转头回望的一刹那,他看到了赛姆勒先生”^②;心中畏惧的赛姆勒先生此时则佯装对刚刚发生的罪恶毫不知情,“他俯下身来朝车外望去,好像要看看公交车马路上要行驶到哪条街道了。96 大街”^③。贝娄以旁敲侧击的方式让读者了解到了本次公车犯罪行为的具体发生地。细心的读者定会关注到“96 大街”这几个字眼。与上文出现的“72 大街”相同,“96 大街”亦位于曼哈顿的上城,两条大街其实指向同一个地理区域,而这绝非巧合。贝娄希望读者能够注意到,黑人扒手在公交车上的两次作案,虽然时间不同,但罪恶发生的地点却惊人一致,均位于纽约曼哈顿的上城地区。作者的目的逐渐显现:他希望能在读者心中,将曼哈顿上城地区与“犯罪”或“邪恶”之间构建某种联系。而贝娄如此建构,其更深层次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贝娄安排赛姆勒先生回忆起了很久以前发生的一件事。“在他读高中时,曾经翻译过(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的一句话,而这句话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恶魔在北方建起了他的城市(The Devil hath established his cities in the North)’^④。”也就是说,北方的城市或者“北方”这个地理区域代表着邪恶的势力。这句话为整部小说定下了基调,而这也与如上所做的、关于地理信息的分析遥相呼应:“北方”“北部”成为极富意蕴的关键词语,而它们都与“邪恶”紧密相连。

有意思的是,贝娄使用纽约曼哈顿作为整个故事的发生地,而纽约地处美国东北部,是典型的“北方”城市,作者使用纽约作为背景,除了暗示小说的犹太主题外,抑或是希望将纽约这一北部城市与“邪恶”势力相互关联。而曼哈顿的“上城”地区则位于纽约曼哈顿岛的“北方”,这种“北方”的双重叠加更为凸显了贝娄的意图:北方城市纽约曼哈顿区的北部地区“上城”是“邪恶”的温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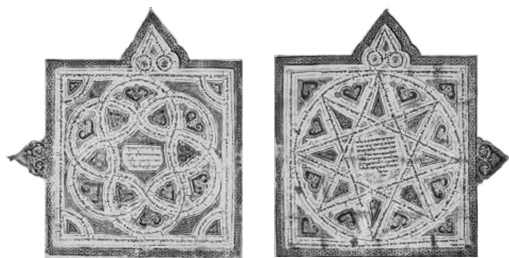
而此时,文本中的另外一条重要的地理信息亦应引起读者注意。小说中,赛

① Saul Bellow, *Mr. Sammler's Planet*, 34.

② 同上,37。

③ 同上,38。

④ 同上,25。



姆勒先生寄居在他的侄女玛丽戈特(Margotte Arkin)的家中,而玛丽戈特的家则位于“西 90 大街的一套大公寓中”^①。不难发现,西 90 大街位于曼哈顿上城的核心区域,这并非巧合,贝娄此举可能意在将玛丽戈特的身份信息与曼哈顿上城这个特定地理信息相互关联。因为,贝娄已经提到,玛丽戈特是一位德国犹太人。而且针对其身份,贝娄在文本中还有一番意味深长的描述:“好像做一个犹太人麻烦还不够多似的,这个可怜的女人还是个德国人。”^②在此,贝娄不仅表明了玛丽戈特的德国犹太人身份,也在隐约间表达了他对德国犹太人的态度:德国犹太人这一群体极为特殊,他们或许为整个犹太社区带来了“麻烦”。贝娄在此埋下了伏笔,而他的目的显而易见,他希望读者能够注意到德国犹太人这一特殊群体,并巧妙设置,通过曼哈顿上城这一特殊地理区位,将德国犹太人与“邪恶”和“麻烦”巧妙联系起来。

针对文本中的另外一名关键人物——赛姆勒先生的女儿苏拉(Shula),作者也给出了相应的地理信息。苏拉经常在垃圾箱中捡拾物品,而对此,贝娄表述道:“他和苏拉一起生活了好多年,就住在百老汇大道以东。在她的老父亲看来,她的太多行为都不可理喻。她狂热地收集各种物件。说白了,她就是个捡破烂儿的,他不止一次地看到她正在百老汇大街的垃圾箱中翻找东西。”^③在此,贝娄表明,苏拉的住所位于百老汇大道附近,而百老汇大道是纵贯曼哈顿南北的一条城市主干道,对读者而言,这样的信息太过笼统;因此,针对苏拉的具体居住地,贝娄在随后又给出了更为明确的地理指向性信息:“她总是在第四大道人行道的垃圾箱中挑拣出各种愚蠢透顶的书籍,这些书书脊发白,而且透着雨水留下的水渍。”^④

第四大道是曼哈顿一条特殊的道路,其并非如其他大道般从南至北,而是介于其北部的公园大道(Park Avenue)和它南面的鲍尔里街(the Bowery),大体位于东 10 街和东 14 街之间。结合上文中提到的她住在“百老汇大道以东”可以判断:苏拉居住地位于百老汇大道和第四大道之间,地理方位明显地处曼哈顿的下城(Downtown),靠近曼哈顿下东区(Lower East Side),而这里是在纽约的东欧犹太移民的传统聚居地点。事实上,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东欧犹太人移民初抵美国始,德国犹太人和东欧犹太人两大犹太族群在纽约曼哈顿就形成了极清晰明确的地理分布特点。欧文·豪在其专著中就提到,为帮助东欧犹太人尽快

① Saul Bellow, *Mr. Sammler's Planet*, 5.

② 同上,13。

③ 同上,16。

④ 同上,43。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6辑

融入美国,德国犹太人专门组建了“教育联盟”(Educational Alliance),“而在其后的几十年中,该联盟成为帮扶新移民的主要力量,而同时也是上城犹太人和下城犹太人之间分歧、争执的主要原因”^①。在此,“上城犹太人”和“下城犹太人”则分别指代德国犹太人和东欧犹太人。可见,在纽约曼哈顿岛,如此上、下城的分布格局维系了相当长时间,而上城、下城则分别成为德国犹太人和东欧犹太人具有标志意义的文化地理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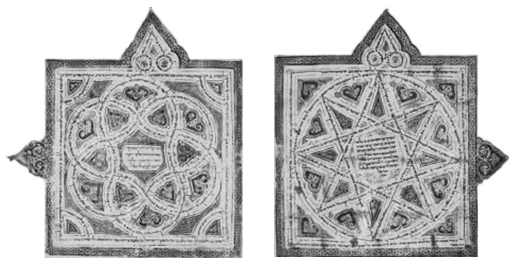
贝娄在文本中通过将苏拉与曼哈顿下城相联系,不仅向读者凸显了她东欧犹太移民的身份背景,更是借机写出了苏拉,亦即东欧犹太移民在生活上的困顿、情感上的空虚及精神上的迷茫。如果说,曼哈顿上城与德国犹太人相互关联,暗示着“富足”掩盖下的“邪恶和堕落”;曼哈顿下城则与东欧犹太人不可分割,隐喻着“贫困”笼罩中的“良善和迷茫”。同在纽约曼哈顿,这两个不同的地理区位是作者在文本中着重强调的文化地理概念,分别被打上了明确的烙印,清晰标明了两大犹太人群体间的鸿沟。东欧犹太人在生活上的无着、精神上的困惑以及在无奈中不得不依附于德国犹太人的苦楚,亦是小说中的一条重要线索。贝娄希望借助曼哈顿的地理信息,和与之关联的社会经济文化属性,以不动声色的方式,吸引读者注意到流散于美国的两大犹太族群——德国犹太人和东欧犹太人。因此,该两类犹太人间的相互关系、彼此影响以及复杂互动将成为贝娄在文本中的核心关注点。而且,他的目的不仅仅限于犹太问题,他希望通过聚焦犹太人在美国的两大族群来说明、阐释西方社会更为根本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二、“邪恶”的德国犹太人

如前所述,贝娄小说中出现的犹太人,均可被明确划入两大群体——德国犹太人和东欧犹太人。两个群体的犹太人是贝娄探查西方文明困境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而“被解放的德国犹太人”及其“所承载的理念”作为文本之关键主题得以在贝娄的叙事安排下首先进入读者视野。

通过对相关地理信息的梳理,读者已形成一个模糊却直观的印象,即德国犹太人与“邪恶”行为有某种微妙关联。在接下来的叙事中,贝娄通过对具体人物的描述,引导读者将这种浅层的模糊印象逐步清晰化。在聚焦德国犹太群体时,贝娄将其进一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天生的德国犹太人;另一类则是通过后天有意识的选择而依附于德国犹太理念的“新”德国犹太人。本节将集中关注前一类

^① Irving Howe, *World of Our Fathers—The Journey of the East European Jews to America and the Life They Found and Made*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0), 235.



犹太人。

所谓天生的德国犹太人,是指生长于德国,或自幼深受德国历史、文化、社会、宗教等客观因素熏陶,形成独有气质、独特精神面貌和价值观念的犹太人。该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在 1848 年欧洲革命失败后移民美国,成为美国犹太人群体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小说中的几位人物如玛丽戈特、格鲁纳医生亡故的妻子荷达(Hilda)和沃尔特·布鲁克(Walter Bruch)均属该类犹太人。贝娄煞费苦心地从中选择了一位代表性人物进行聚焦,沃尔特·布鲁克由此进入读者视线。针对其“代表性”,贝娄在沃尔特第一次露面时,就围绕其身份做了如下说明:“走进来的是沃尔特·布鲁克,是本家的一位亲戚,沃尔特是玛丽戈特的表兄,他和格鲁纳医生一家也沾亲。”^①短短一句话即交代出沃尔特基于血缘而形成的特殊身份,他与小说中上述几位人物均沾亲带故、彼此联系;几条有关德国犹太人的叙事线索都围绕他交叉汇集,德国犹太人的特质在他身上得以集中彰显,他成为小说中德国犹太人间的桥梁和纽带。据此,贝娄赋予其天然的“代表性”,让他不仅仅代表家族,还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整个德国犹太人群体。

首先,贝娄聚焦沃尔特的宗教信仰,探究其颇不寻常的宗教观念及行为:

在他早年刚移民美国时,他和另外一名德国犹太人一同受雇于梅西百货公司的一家仓库,他们互相给对方做弥撒,一个人躺在包装箱中,手腕上缠着从廉价商店买来的念珠,而另外一个人则开始做弥撒。^②

在此,贝娄探查了沃尔特极“异类”的宗教实践行为。身为犹太人,其却在践行天主教之特有宗教行为“弥撒”,这明显构成叛教(apostasy)。沃尔特的行为是其叛教导致的信仰真空状态的一种极端表达。犹太正统派作家赫尔曼·沃克(Herman Wouk)曾对德国犹太人及其叛教行为有过论述:在 19 世纪的德国,“启蒙运动所赋予的新自由”使得“成千上万名犹太人穿过犹太隔都墙壁的间隙,走向叛教(apostasy)的道路”。^③可见,通过聚焦沃尔特的叛教行为,贝娄一方面强调了沃尔特“被解放”的德国犹太人的身份,呼应小说“被解放的德国犹太人”这个关键主题;另一方面,也在影射(犹太)“启蒙运动”,为进一步揭示该运动与沃尔特的邪恶特质之关联埋下伏笔。贝娄还就此传递出一条隐含信息,即德国犹太人“被解放”的事实成为此后他们叛教等行为的直接原因。

此外,贝娄以赛姆勒和沃尔特聊天行将结束时的一件小事作为点睛之笔,来

^① Saul Bellow, *Mr. Sammler's Planet*, 45.

^② 同上,46。

^③ Herman Wouk, *This Is My God* (New York: Pocket Books, 1973), 202.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6辑

加深读者对以沃尔特为代表的“被解放”的德国犹太人叛教行为的认知,亦为接下来聚焦其对“独特性”的追求做好铺垫。听完沃尔特的痛苦倾诉,赛姆勒安慰道:“沃尔特,我会为你祈祷的。”但如此一句稀松平常、颇富宗教意蕴的话所引发的反应却令人始料不及:“赛姆勒叔叔,你什么意思?你祈祷?赛姆勒叔叔,我有胳膊,你有祈祷经文?”^①作为被“解放的”德国犹太人,沃尔特在叛教的同时转而选择信奉“(女性)胳膊”。这种颇为独特的“恋物癖(fetishism)”^②侵入信仰真空状态的沃尔特,成为指导其行为的准则。由此,他才会做出以上表态后“捧腹大笑”^③,并以此凸显其对赛姆勒犹太教信仰的不屑和他叛教行为的彻底。

其次,贝娄借其对“胳膊”的迷恋,开始探讨沃尔特对“独特性”或“个体性”的有目的的追寻。作为“被解放的”犹太人,他在处处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而对女性胳膊的迷恋则是对该理念的具体表达。贝娄借他这种奇特的变态“恋物癖”一方面影射了德国犹太人观念与行为上的“邪恶”及由此导致的痛苦无助,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一生都是如此。我深陷其中,不能自拔。”^④另一方面,亦在暗示“独特性”和“邪恶”间的可能关联。贝娄希望借这种颇不寻常的“恋物癖”来强调被“解放的”德国犹太人对“独特性”或“个体性”的追求。对此,贝娄在文中进行了细致的阐释:

人人都在追求世界上奇特非凡的东西,或者希望成为奇特、非凡的人物。他们自己想成为拥有一身罕见羽毛的鸟儿;想成为形状怪异、发育畸形的鱼儿,想成为举止荒谬、特立独行的人类。^⑤

贝娄在此描绘出西方社会的一幅芸芸众生相,经启蒙运动被“解放”后,他们急不可耐的开始标榜“个性”,追逐与众不同,沃尔特作为被“解放”的犹太人,自然也不能免俗。沃尔特希望通过对“女性胳膊”的迷恋来彰显自己的独特和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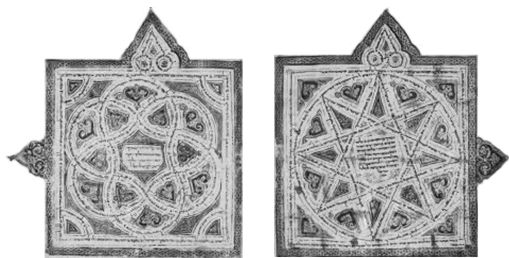
① Saul Bellow, *Mr. Sammler's Planet*, 51.

② 同上,50。

③ 同上,51。

④ 同上,48。针对自己的邪恶变态行为,沃尔特颇为痛苦。他往往都是通过这种变态的发泄获得满足,而满足后他的内心却又陷入极度痛苦、煎熬和不安的状态。因此,他每每事后找到赛姆勒倾诉,以寻求慰藉。

⑤ 同上,50。有学者指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感知运动盛行于美国文学界,这场运动的成员把自己看作是反文化的一部分……赞同个体行为和表达方式的自由……贝娄对这股思潮持反对意见”。详见张军 Zhang Jun、张兰 Zhang Lan,〈论《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战争创伤书写与引路人建构的疗伤机制研究〉[*War Trauma and Mentor-guided Trauma Healing Mechanisms in Saul Bellow's Planet*],于《当代外国文学》[*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2022年第3期[2022, Issue 3],97。可见,贝娄在此从另一个侧面,通过对这种思潮和行为的反对和批判,展示了他对以沃尔特为代表的德国犹太人行为的厌恶,他为这类行为打上了明显的负面烙印。



凡,这无疑是在表达其在获得“解放”后对“个体性”的追求。

起初,赛姆勒先生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种“个体性”或“独特性”对沃尔特的重要和不可或缺。因此,在听完沃尔特的倾诉后,他如此安慰沃尔特:

你又没害过任何人,而且现在人们把这种事看得很淡,根本不像从前那样了……你的困境和其他人的非常相似……每个人似乎都有这样的邪恶习气(vices),而且还把这些事公布于众。现在,你这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真的,你的问题其实和 19 世纪克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奥地利精神病学家、性学研究创始人)的问题没啥两样,老生常谈了。^①

最后,赛姆勒明确将沃尔特的这种标新立异的变态行为定义为“邪恶习气”,贝娄也就在看似不经意间向读者挑明了德国犹太人沃尔特身上的“邪恶”特质。鉴于沃尔特基于血缘身份关系而与生俱来的“代表性”,贝娄其实等于将这种“邪恶”特质与德国犹太人群体相互关联,为德国犹太人钉上“邪恶”之标签。

赛姆勒的上述言论其实发自肺腑,他希望以此减轻沃尔特的负罪感,舒缓其因邪恶行为所致的精神压力和道德愧疚。但随后,在一段长长的内心独白中,赛姆勒先生终于意识到了自己如此表态可能会引发的问题。对被“解放的”德国犹太人而言,他们追求、向往的乃是“独特”和“个性”,沃尔特也不列外。因而,赛姆勒先生对当时自己安慰沃尔特的话深感后悔,在内心独白中,他有感而发:“很有可能,在沃尔特不再悲伤,不再哭泣的时候,他会因我提到的克拉夫特·埃宾的事而感到受伤,也会因为我说的他这种反常行为没啥特别的而感到难受。”^②因为,对沃尔特而言,自己苦苦追求的就是这种有别于别人的“独特”和“个性”,如果他的行为没有区别、独特于别人,那么就意味着他对“个性”的追求全然失败,他自然会因此而受伤。在贝娄笔下,对于“被解放的”德国犹太人而言,他们丧失了信仰的约束,突破了道德的掣肘,在对个性的追寻中彻底迷失了自我,走上了“邪恶”的不归之路。在此,贝娄从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德国犹太人的视角,揭露了“个体性”当道下的西方社会众生相,并由此引申出西方社会在个人和社会层面的深层问题。下一节,本文将聚焦“邪恶”的德国犹太人给“良善”的东欧犹太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阐释贝娄笔下的德国犹太人缘何“邪恶”。

^① Saul Bellow, *Mr. Sammler's Planet*, 48.

^② 同上,50。

三、东欧犹太人对德国犹太人经济攀附所引发的道德混乱

贝娄在小说中的叙事进程一直徘徊于德国犹太人和东欧犹太人之间。两大犹太移民群体在曼哈顿均有集中分布,虽然彼此关联密切,却又自成一体。本文第一节所聚焦的双方在曼哈顿岛地理分布上的泾渭分明,是双方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阶层界限上的直观、外在投射。即便有鸿沟横亘其间,德国犹太人对东欧犹太人由交往所致的负面渗透和道德腐蚀却悄无声息地持续推进,并最终导致后者陷入道德失序之困境,而这才是贝娄在小说中聚焦的主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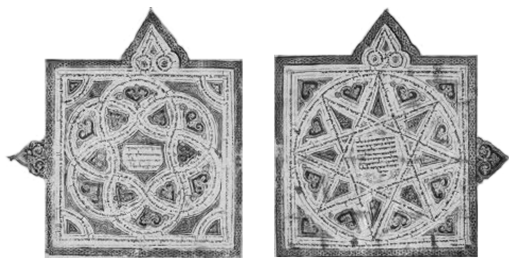
作者笔下的东欧犹太人特点鲜明——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从德国犹太人那里接受资助、寻求庇护,简言之,东欧犹太人普遍依附于德国犹太人。这其实反映了曼哈顿岛上两大犹太人群体的真实情况,初来乍到的东欧犹太人总会或多或少在某些方面得到先来一步、已在纽约落地生根的德国犹太人的接济,对德国犹太人的依附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贝娄就此将历史的真实移植入小说的虚构中。针对德国犹太移民和东欧犹太移民之间的关系,欧文·豪(Irving Howe)在其专著中进行过阐释:“(先期而来的)德国犹太人已经彻底美国化了,他们中的许多已经发家致富,并且通过跻身美国共和党获得了政治影响力。在(20)世纪之交时,已在美国落地生根的德国犹太人与东欧犹太人间的矛盾冲突已极为尖锐,令人担忧。”^①

可见,虽然两大美国犹太族群在经济、政治层面存在不可逾越的屏障,但双方的相互交往及由此产生的矛盾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东欧犹太人对德国犹太人的攀附、向德国犹太理念的妥协,以及由此而来的东欧犹太人之“德国犹太化”及其负面后果都被贝娄象征性地精确浓缩于格鲁纳医生的家庭生活中。

格鲁纳医生作为小说中的一名关键人物,关于其出身和身份,贝娄在介绍他的家庭生活时就给予了明确的界定:“格鲁纳是一名东欧犹太移民”^②;而他的

^① Irving Howe, *World of Our Fathers—The Journey of the East European Jews to America and the Life They Found and Made*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0), 234-235. 针对德国犹太人和东欧犹太人间的相互关系,欧文·豪进一步阐释:“但是,虽然他们(德国犹太人)总是对东欧犹太人摆出一副令人恼火的、极富优越感的姿态,但德国犹太人也承认他们之间确有关联,他们很难对这种关系做出解释,但却又很少希望否认这层关系。双方的争斗随之而来,有时如兄弟般亲密,而有时却又咬牙切齿、怒目以对……”同上,235。

^② Saul Bellow, *Mr. Sammler's Planet*, 63.



“妻子是一位德国犹太人”^①。值得注意的是，贝娄在此使用了 *Ostjude*^② 这个德语单词，而这实际隐藏着三重含义。首先，他借此暗示，在这个东欧犹太人和德国犹太人共同组建的家庭中，德语处于支配地位，这也间接表明这位德国犹太妻子在家庭中的强势地位；其次，贝娄还借该德语单词，含蓄表达了格鲁纳医生在家庭生活中受支配、依附于人的窘况；最后，作者亦借机影射了格鲁纳医生的妻子对格鲁纳东欧犹太人身份的贬低之意。可见，这个界定其身份的德语单词就成为一窥其家庭境遇的最佳注脚。

为进一步明确该印象，贝娄随后指出：“她认为，自己在社会层级上是高于他的……而且她的任务就是提升改造他，然后帮助他建立他的医疗执业生涯。”^③ 格鲁纳医生虽然对于德国犹太人和东欧犹太人身份、地位的差距十分敏感，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双方之间的巨大鸿沟，因此“（他）对自己妻子社会地位高这一情况深信不疑”^④。这是其在家中依附于人的又一佐证。在此，作者意在强调一个事实，即格鲁纳医生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亦表明德国犹太人精神理念已经对其产生了深刻影响，其内心深处认同并依附于德国犹太人所彰显的理念和精神。^⑤ 因此，本质上看，格鲁纳医生是贝娄笔下“新”德国犹太人的化身；但他同时亦残留着东欧犹太人某些根深蒂固的情感。格鲁纳医生的境遇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极富代表性。贝娄在此强调：德国犹太人的精神和理念代表着一股主流的社会思潮，其本身由于经济地位的优势，对其他犹太族群产生了重要吸引，因此，东欧犹太人才认同其理念，纷纷向其靠拢，求得攀附。而正是在此大背景下，以剧作家雅各布·高丁(Jacob Gordin)为首的意第绪语知识分子才会发出如此震人心魄的呼唤：“是时候将下城犹太人对德国犹太人的过分依赖中解脱出来了。”^⑥

贝娄安排赛姆勒先生围绕格鲁纳医生展开叙事，伴随故事的进展，读者将逐渐认识、了解这个人物。首先，他是一位“慷慨”的人。赛姆勒先生回忆道，“自1947年以来，他和苏拉一直靠着格鲁纳医生的资助生活，他支付他们的房租，专门为苏拉量身定做了一份工作，还在他们的社会保险金和德国政府战争赔款之

① Saul Bellow, *Mr. Sammler's Planet*, 63.

② 原文为:Gruner was an *Ostjude* immigrant.同上。

③ Saul Bellow, *Mr. Sammler's Planet*, 63.

④ 同上。

⑤ 事实上，即便在事关犹太教信仰方面，格鲁纳医生也是屈从于其妻子对犹太教的倾向和选择，“在犹太重大节日的时候，前往位于第五大道的犹太会堂”，为此，贝娄还在随后专门解释道：“犹太会堂是荷达的选择。”同上，234。

⑥ Irving Howe, *World of Our Fathers—The Journey of the East European Jews to America and the Life They Found and Made*, 239.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6辑

外,补贴他们的生活”^①。可以说,格鲁纳医生的慷慨相助是赛姆勒父女二人在纽约得以立足的根本保障。其次,贝娄还提到了格鲁纳医生的怀旧和对过往东欧生活的眷恋。“他十岁时离开故国(波兰),对克拉科夫城(Cracow)^②的那种魂牵梦绕始终无法释怀。而且他希望回忆有关祖父母、姑婶阿姨、堂表兄弟的点点滴滴,但其实赛姆勒先生本身和这些人也没什么过多交往。”^③可见,格鲁纳医生念旧且对故国的人和事满怀深情。赛姆勒先生针对格鲁纳医生有过这样一个总体评价:“身为妇科医生,格鲁纳赚了很多钱,后来,他在房地产领域的收益更为丰厚,整体看来,他是一个厚道、善良的人,而且很重视亲情。”^④这是对格鲁纳医生积极、正面的评价,也使读者对格鲁纳医生形成了最初印象和表层判断。

此外,针对格鲁纳医生,贝娄用简单的一句话进行总结:“但是,在移民美国半个世纪之后,格鲁纳医生本人依然算得上是一位移民。”^⑤贝娄希望由此传达的不外乎如下两方面内容:一方面,他怀念旧情、沉溺过往,一直未能忘记自己的东欧犹太人身份;另一方面,他入乡随俗,攀附德国犹太人,受到了德国犹太人理念的重大影响。因此,即便50年后,他依然是“一位移民”,他的价值观受到了东欧犹太人出身和德国犹太人思维理念的双重影响,其人生在两种势力的交错作用下蹒跚而行,他依然是一位心态上漂泊不定的“移民”,而非思想上笃定安宁的“土著”。

贝娄以此“依然是移民”的表述,勾连起下一步其在文本中将着重谈及的“邪恶”行为主题。事实上,贝娄在文本中不动声色地触及格鲁纳医生隐匿极深的“邪恶”,并由此更进一步聚焦因攀附于德国犹太人而被“德国犹太化”的东欧犹太人所面临的负面后果——道德层面的失序和困境。这是贝娄在文本中就此前已经串联起的有关“邪恶”与德国犹太人关联的一种回溯。

格鲁纳医生某些隐秘的“邪恶”行为首先由其子华莱士(Wallace)透露出来。华莱士在和赛姆勒先生聊天时提到,他的父亲格鲁纳医生有一大笔钱藏匿在居住的别墅中。针对其父的行为,华莱士有这样一番表态:

父亲有时会去帮助那些有钱有势的人,给他们做手术,就是刮宫术。只有当这些人家遭遇严重危机,他们家中的那些年轻的、出身上流社会的女继承人被人搞大了肚子时,他才会去。这是绝对保密的。只是出于同情,我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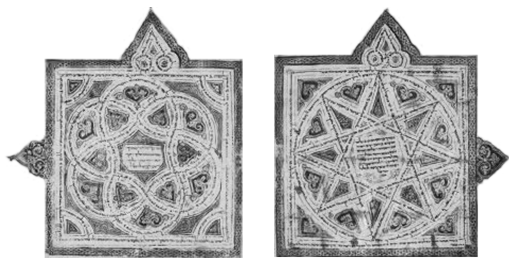
① Saul Bellow, *Mr. Sammler's Planet*, 61.

② 波兰的历史名城,在该城曾有大量犹太人聚居。

③ Saul Bellow, *Mr. Sammler's Planet*, 62.

④ 同上,61。

⑤ 同上,62。



亲很同情那些社会名流,因此也赚到了不少钱。^①

华莱士所说的身居高位、有钱有势的社会名流其实就是黑手党人,这一细节在小说的临近末尾处得到了证实:“如此看来,华莱士有关其父亲的所言不虚。他帮过黑手党的忙,做过一些手术。他也就确通过这种方式赚了钱。”^②可见,格鲁纳医生与黑手党人确有关联,有鉴于黑手党人邪恶凶残的本质,贝娄在此实则有意将格鲁纳医生的行为与“邪恶”相互勾连,目的是让读者注意到格鲁纳医生人性的另一个侧面。更为重要的是,贝娄通过赛姆勒先生的回忆,毫无掩饰地透露出格鲁纳医生从事这些邪恶行为的关键原因:

他自己(格鲁纳医生)是一个被套牢的人。荷达可是比他强势的多,在他黑手党式的大摇大摆之下,其实只不过是一种佯装出来的无法无天。但是,那个身量不高、头发蓬松、双腿如竹竿般纤细、裙摆长短大方得体,气质高贵、彬彬有礼的荷达才是真正的罪犯。伊利亚(格鲁纳医生)全在她的掌控之下。^③

以上,贝娄通过赛姆勒先生的回忆直接切入要害,极为明确地向读者传达了一条关键信息,格鲁纳医生所谓的“邪恶行径”其实都缘于其妻子荷达——一位德国犹太人。由此,贝娄一方面简洁明了地再次重申了德国犹太人的“邪恶”;另一方面,强调了德国犹太人对受其控制、被其左右的东欧犹太人的邪恶影响。可以说,正是由于德国犹太妻子的“强势”和“掌控”,才导致格鲁纳医生和黑手党的罪恶扯上关系,并由此最终导致了格鲁纳医生道德层面的失序和混乱。

华莱士针对其父格鲁纳医生曾总结陈词般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如果一个人的内心如同西瓜那样,红瓤、黑籽一般清晰明了就好了。”^④换句话说,假如格鲁纳医生的内心,如非黑即白那般简单就好了。这只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希望而已,实际上格鲁纳医生的内心矛盾且复杂,并非红瓤、黑籽般秩序清晰、一目了然,而是毫无秩序的一团混杂。不难发现,贝娄有意将格鲁纳医生塑造为一个矛盾交织、颇为复杂的人物。他既有怀旧、善良、慷慨这般“良善”的特质,也有颇见不得人的“邪恶”品行,而这种品性的杂交复合并非简单的添附,而是深层次的复杂交融,彼此犬牙交错、含混不清,贝娄实则以此暗示格鲁纳医生道德层面的无序和混乱。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所展现出的复杂的人格其实源于其对两大

① Saul Bellow, *Mr. Sammler's Planet*, 83.

② 同上,258。

③ 同上,235。

④ 同上,83。

犹太移民群体融合的民族情感的思考,源于对他本人“移民”角色的身份定位。在贝娄看来,格鲁纳医生身上的“良善”来自其东欧犹太人的血统,而其“邪恶”则与其攀附德国犹太人的事实紧密相关。因此,“邪恶”和“良善”在他的灵魂深处混杂交织,德国犹太人的特质和东欧犹太人的精神内涵在他的骨子里无序融合,格鲁纳医生必然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人物。

四、邪恶德国犹太人“个体性”追求下的混乱和失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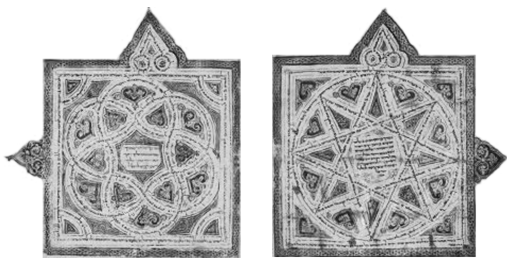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如前所述,小说中的重要群体德国犹太人被赋予“邪恶”之内涵,为什么贝娄给德国犹太人贴上如此负面的标签?作者如此论证,其笔锋指向什么,最终目的又是什么?寻根溯源,这与德国犹太人的历史境遇密不可分。从历史上看,发生于18—19世纪的犹太启蒙运动(亦称哈斯卡拉,Haskalah)始于德国,该“运动的奠基人是德国犹太思想家摩西·门德尔松。18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门德尔松及其弟子的倡导下,柏林首先形成了哈斯卡拉中心”^①。可见,德国是犹太启蒙运动的发起之地,而德国犹太人也因“地利”使然,耳濡目染间最早、最深地受到该运动的影响。此外,在论及犹太启蒙运动的重大意义时,许多西方著名学者将“犹太启蒙运动看作是‘隔都时代’与‘解放时代’的分界线”^②。可以说,正是犹太启蒙运动将犹太人从犹太教及犹太传统等一系列刻板、严格的束缚中解放出来。^③由此,这场运动对犹太人的解放而言,具有关键意义。结合文本,贝娄笔下的德国犹太人,正是由于犹太启蒙运动的兴起和其理念的持续深化而被“解放”的犹太人。解放后的犹太人,开始走出隔都,背离宗教,开启了“现代性”意义上对“自我”和“个体”的狂热追寻。毋须讳言,犹太启蒙运动在本质上发轫于欧洲的启蒙运动。因此,犹太启蒙运动内在地沿袭欧洲启蒙运动的精神实质。比如,在对个体的重视上,“哈斯卡拉在提高个人及人类的地位方面与欧洲启蒙运动是雷同的”^④。对犹太启蒙运动的探究也需要寻根溯源地从欧洲启蒙运动开始。两者一脉相承的特质也在暗示,贝娄在文本中所关注的群体可能不仅仅

① 张倩红 Zhang Qianhong,《犹太启蒙运动初探》[An Initial Exploration of the Jewish Enlightenment],于《世界历史》[World History],2002年第5期[2002,Issue 5],62。

② 同上。

③ “这场运动从18世纪70年代一直持续到19世纪80年代,旨在改革犹太教对传统和集体主义的过分倚重,将一种更具理性、分析性、智性和个性的生活方式引入犹太社会。”Daniel Gordis 丹尼尔·戈迪斯,《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Israel: A Concise History of a Nation Reborn],王戎 Wang Rong 译(杭州[Hangzhou]:浙江人民出版社[Zhejiang Renmin Publishing House],2018),12。

④ 张倩红,《犹太启蒙运动初探》,64。



局限于德国犹太人,他可能是用德国犹太人来指涉被启蒙运动所解放的西方民众。

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传统的欧洲社会处在剧烈的调整和变革时期,发生了诸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一系列思想、文化、军事和政治等方面的事件”^①。有学者对这一系列的事件进行了系统性的归纳,认为“最能够清晰定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市民阶层的政治革命、工业化的崛起以及社会分层的开始与持续这一连串相互关联的世界性历史事件基本特征的核心概念,就是‘现代性’了”^②。而“现代性所提供的最重要、最核心的历史事实与经验便是个体性或个体化”^③。学者甘绍平对“个体性”概念做了进一步的阐释:

“个体性”概念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是个体的独特性。每一个人都因其唯一性而与他人具有着差异……人的独特性与多样性甚至被视为一种道德上的要求……生命的使命在于充分展现自身的独特性……二是个体的自我决定。^④

由此,联系本文第二节对德国犹太人沃尔特所做的分析可以发现,贝娄笔下的沃尔特无疑典型地彰显着“个体性”的理念精髓。作为一名被“解放”的德国犹太人,沃尔特陷入了一种对“个性”和“独特”的极致追求中。而他的这种孤注一掷追求“独特”的行为(个体化行为)则可能会导致一种“极端”状况的出现,即“作为个体的当事人完全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从自尊过渡到自傲再到自我膨胀和无度的自私”^⑤。沃尔特言行中不管不顾、只欲达成自己变态满足的自私行为和心态无疑契合此处描述的这种“极端”情况。实际上,贝娄在小说文本中就通过赛姆勒先生对“个体性”作出了直截了当的评价:“我过去就一直说,这场赋予人类个体性(individuality)的解放(liberation)本身并不是一个巨大的成功。”^⑥在此,贝娄毫无掩饰地对启蒙运动后的解放,乃至解放背后的德国犹太人给出了颇为负面的评价。

进一步分析,这种“个体化”行为有可能在社会意义上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即“在现代性时代,具有不可逆向的个体性进程既意味着自由、开放和幸福,但对

① 张礼刚 Zhang Ligang,《柏林哈斯卡拉运动兴起的犹太因素》[The Jewish Factors in the Rise of the Haskalah Movement in Berlin],于《学海》[Academia Bimestrie],2015年第6期[2015,Issue 6],183。

② 甘绍平 Gan Shaoping,《个体的崛起与道德的主体》[The Rise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 Moral Subject],于《哲学动态》[Philosophical Trends],2021年第8期[2021,Issue 8],101。

③ 同上,101—102。

④ 同上,104。

⑤ 同上,106。

⑥ Saul Bellow, *Mr. Sammler's Planet*, 189。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6辑

于一部分人而言,也可能意味着失控的激情、无度的欲望、极端的自私、对秩序和规则的蔑视……”^①。而在贝娄看来,德国犹太人之所以邪恶^②,表面看似体现在以沃尔特变态行为为代表的离经叛道事实本身;而更深层次来说,是由于以沃尔特为代表的被“解放”的犹太人对“独特性”的刻意追求,从而“完全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并由此可能带来个体和社会层面上“失控的激情”和“对秩序和规则的蔑视”。由此,贝娄通过沃尔特的介入,进一步引入了“秩序”和“失控”的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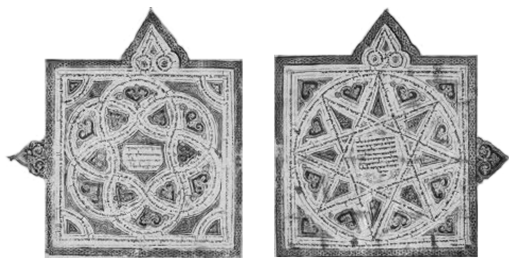
贝娄在文本中多次谈及“失控”和“秩序”,这体现了他对秩序的关注和重视。比如,结束在哥伦比亚大学^③失败的演讲后,赛姆勒先生对学生混乱、无礼的表现十分震惊,感觉自己的尊严受到了践踏,自然对此事愤懑不已。他在随后的思索中,其实找到了这些学生的问题所在,因为“当他们的内在处于有序状态时,他们的表现也必然有序”^④。也就是说,赛姆勒先生认为,从个体层面而言,这些学生之所以(外在)“表现”粗暴无礼、行为混乱,是因为他们本身的“内在”就缺乏秩序、浑沌不堪。所以,贝娄实则是借赛姆勒先生之口,指出“秩序”的重要性,以及西方社会由于缺乏“秩序”导致“失控”的事实。他在大声呼吁,西方社会应当追求秩序,而非个性。

① 甘绍平 Gan Shaoping,〈个体的崛起与道德的主体〉[The Rise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 Moral Subject],于《哲学动态》[Philosophical Trends],2021年第8期[2021,Issue 8],106。

② 贝娄给德国犹太人贴上“邪恶”标签的行为可能还夹杂着个人情感因素。贝娄于“1966年12月与妻子苏珊分居。开始写长篇小说《赛姆勒先生的行星》”;此后,1968年10月“和苏珊离婚”;1969年8月该小说完稿。Saul Bellow 索尔·贝娄,《索尔·贝娄书信集》[Letters of Saul Bellow],杨晓荣 Yang Xiaorong 译(北京[Bei Jing]:人民文学出版社[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2021),335,17,18,361。可见,在该小说的创作期间,贝娄正经历着与第三任妻子苏珊·格拉斯曼(Susan Glassman)的婚姻所带来的痛苦和无奈,而苏珊正是一位德国犹太移民的后代。贝娄的传记作家里德(Zachary Leader)在描写苏珊的父亲弗兰克·格拉斯曼医生(Dr. Frank Glassman)家的富裕生活时写道:“格拉斯曼一家生活优渥,而这一切都是拜弗兰克的收入所赐。弗兰克的座驾是一辆凯迪拉克,而且他还是标准俱乐部(Standard Club)的成员(标准俱乐部是德国犹太人的组织,要比马里所在的、面向东欧犹太人的契约俱乐部[(Covenant Club)]在社会层级上高上一等)”。Zachary Leader, *The life of Saul Bellow: To Fame and Fortune 1915-1964*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16), 595。文中提到的“马里”指的是贝娄的大哥马里·贝娄(Maury Bellow)。由此,贝娄对德国犹太人的负面态度抑或夹杂着部分个人感情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贝娄在作品中对德国犹太人所展现的敌视态度。但是,贝娄的剑锋所指、用意之深绝不仅限于此。

③ 之所以谈及哥伦比亚大学,贝娄可能意在以发生于1968年4月下旬哥伦比亚大学的那场骚乱来影射一种极端“混乱”和“无序”的状态。“1968年4月22日,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举行示威抗议活动”以“反对防务分析研究所为五角大楼从事研究活动……次日,学生抗议发展为校园暴动,后来进占了校长办公室”。随后,“学生在校长办公室的地毯上小便,占领学校的一座建筑物并在教授办公室内任意破坏”。吕磊 Lv Lei,《美国的新保守主义》[The Neo-conservatism in America](南京[Nanjing]:江苏人民出版社[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4),71-72。

④ Saul Bellow, *Mr. Sammler's Planet*, 36。



此外,在社会整体层面,贝娄也提及了“秩序”的匮乏。走在纽约脏乱、无序的大街上,赛姆勒先生再次陷入沉思:“赛姆勒先生认为,白人新教徒的美国未能达成最佳的秩序,对此他非常恼怒……这不是一个强有力的统治阶层”^①。很明显,从社会层面而言,赛姆勒依然认为其缺乏“秩序”,与自己心中有关“秩序”的预期相距甚远,这种无序的状态促使他呼吁由一个更强有力的统治阶层来实现更好的“秩序”。可见,贝娄认为,无论从个体层面还是从社会整体层面而言,西方社会均呈现出“秩序”的匮乏,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的滋生。

文本中的混乱和无序其实呼应、投射着小说创作期间美国的时代特征。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充满着动荡和无序,黑人民权运动风起云涌、肯尼迪遇刺、越战反战浪潮的激荡都显现着整个时代的秩序匮乏。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小说完稿前的1968年,正“是美国社会暴力、骚乱、不安达到顶峰的一年,不仅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②在这一年被枪杀,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也在同年遇刺,美国政府还会每天向民众通报越战死亡人数”^③。所有这一切都使处于风云激荡时代的贝娄开始思考秩序的宝贵价值和无序的重大风险,而在作品中展示出自己的思考、彰显时代的烙印就变得再自然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贝娄在文本中对格鲁纳医生和他妻子荷达的命运安排。荷达在故事开始时就已离世,而格鲁纳医生在小说行文结束时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一头一尾的两个“死亡”并非偶然,而是折射出贝娄对西方文明病入膏肓、无药可医、必然走向衰亡的一种带有强烈预言性质的情节安排。荷达本身就是一名“天生的德国犹太人”,而格鲁纳医生则是一位深受德国犹太理念影响、处处彰显德国犹太人精神实质的“新”德国犹太人。德国犹太人的理念、精神和气质是该夫妇共同的烙印,而两人的死亡则影射了德国犹太理念(抑或其影射的西方文明)气数将尽的悲凉和逐渐式微的命运。

^① Saul Bellow, *Mr. Sammler's Planet*, 86.

^② 1966年,“贝娄接受《生活》(*Life*)杂志稿约,为正在竞选纽约州参议员的罗伯特·肯尼迪写人物简介;跟随肯尼迪活动一个星期……”。Saul Bellow 索尔·贝娄,《索尔·贝娄书信集》[*Letters of Saul Bellow*],杨晓荣 Yang Xiaorong 译(北京[Bei Jing]:人民文学出版社[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2021),17。由此可见,贝娄其实对罗伯特·肯尼迪并不陌生;两年后,肯尼迪遇刺必然给贝娄的内心带来强烈的冲击,并由此促使其对当时美国社会的无序、暴力展开思考。

^③ 席楠 Xi Nan,《索尔·贝娄小说政治思想研究》[*Study of Political Thoughts in Saul Bellow's Novels*](广州[Guangzhou]:中山大学出版社[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2020),101。

结 语

贝娄绝非一位安囿于书斋一隅的学者型作家,他的思维和视角也不仅仅局限于犹太人和犹太团体,而是触及不断发展变化的美国抑或是西方当代社会。可以说,“当下社会的状况与贝娄的创作紧密相关”^①。贝娄对当时美国社会的思考,以及与本文所分析归纳的贝娄对社会根本症结一脉相承的立场,其实在其197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演说辞中有极其明确的表达:

个人生活方面,骚动无序或几近恐慌;在家庭生活方面——对丈夫、妻子、父母、孩子而言——混乱;对民众行为,个人忠诚,性爱实践——更进一步地混乱。我们正是努力生活在这样一种个人骚乱无序、公众迷惑混乱的环境中。^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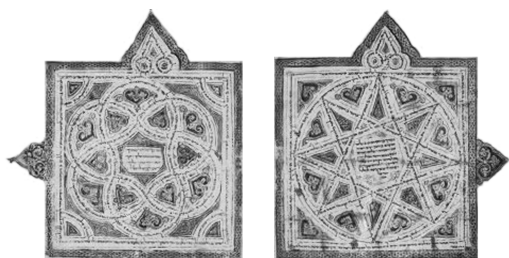
可见,贝娄在演说辞中明确表达了自己对当时美国社会从个体到家庭再到群体行为方面“混乱”和“无序”的担忧。于贝娄而言,他所担心和忌惮的犹太个体“混乱”和“无序”的生活状态是由犹太启蒙运动所孵化衍生出的“个体性”导致的。为此,他在文本中象征性地为犹太启蒙运动的直接结果——被解放的德国犹太人——贴上“邪恶”的标签;而如果要寻根溯源的话,上述社会状况的出现则与孕育犹太启蒙运动的欧洲启蒙运动密不可分。由此,贝娄看似探查“邪恶”的德国犹太人,实则在本质上关切了整个西方社会:通过透视德国犹太人背后的“犹太人解放”以及“邪恶”德国犹太人对“良善”东欧犹太人的充满罪孽的渗透和影响,来探讨追寻人性解放、弘扬“个体性”背景下的西方社会所面对的个体困境及由此导致的社会意义上的“无序”和“混乱”。贝娄悲观地触及了西方社会的本质矛盾和问题。^③

贝娄批判矛头的所指在本质上而言并非德国犹太人这一群体,而是该犹太群体所体现和彰显的那种毫无节制的背叛传承以及对解放、自由和个性等方面

① 乔国强 Qiao Guoqiang,《美国犹太文学》修订版[American Jewish Literature revised edition](上海[Shanghai]: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9),340。

② 同上,341。

③ 贝娄在1966年11月16日回复一位伦敦读者的信中提到,“作为英国人,您会在《赫索格》里看到犹太人的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事。表面来看,这是一本犹太人的书,然而对我来说,真正的主题要深刻的多”。Saul Bellow 索尔·贝娄,《索尔·贝娄书信集》[Letters of Saul Bellow],杨晓荣 Yang Xiaorong 译(北京[Bei Jing]:人民文学出版社[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2021),335。在写这封信几天之后,贝娄开始着手创作《赛姆勒先生的行星》,这部同样表面看来是描写犹太人的书,同贝娄在信中所说的一样,“真正的主题要深刻的多。”



孤注一掷的追求。德国犹太人身上直接、明确地凸显了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人性解放旗帜标榜下的对自由、个性和解放的无休止追寻。可以说，德国犹太人是犹太世界中，西方社会人性解放运动中的最直接产物和最明确化身，德国犹太群体因该运动在本质上继承了西方启蒙运动所主导的理念和思维。由此，在文本中贝娄对该群体展开批评，反映了贝娄对整个西方文明解放过度、自由过限，对个性的追求用力过猛而陷入走火入魔困境，最终引发社会混乱的一种警觉和担忧。